



馬克思
哲學的貧困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馬克思

哲学的貧困

答蒲魯东先生的“貧困的哲学”

人 民 出 版 社

一九六二年·北京

К. МАРКС
НИЦЕТА ФИЛОСОФИИ

馬 克 思
哲 学 的 貧 困

人民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陽門大街 320 号)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 1 号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 850×1168 毫米 $\frac{1}{32}$ · 印張 5 $\frac{7}{8}$ · 插頁 2 · 字數 136,000

1949 年 9 月第 1 版 1961 年 11 月第 3 版
1962 年 9 月北京第 10 次印刷

印數 80,501—92,050 定價 (四) 0.54 元

統一書号 1001·1

本书編排順序，系以苏联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 1956 年版为据。书中正文“哲学的貧困”和附录“关于自由貿易的演說”及书末“注釋”，譯文均采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四卷。恩格斯写的“序言”和“第二版序言”，系据德文版新譯出的，譯者徐坚。附录中的“政治經濟学批判”（摘录），譯文采自我社 1959 年版徐坚譯本；“論蒲魯东”和“致巴·瓦·安年科夫”，譯文分別采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中文版第一卷和第二卷。

目 录

恩格斯 德文版序言	1
恩格斯 德文第二版序言	16
馬克思 哲学的贫困 答蒲魯东先生的“贫困的哲学”	17
序言	21
第一章 科学的发现	23
第一节 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对立	23
第二节 构成价值或綜合价值	33
第三节 价值比例規律的应用	61
甲、货币	61
乙、劳动的剩余	70
第二章 政治經濟学的形而上学	80
第一节 方法	80
第一个說明	81
第二个說明	85
第三个說明	86
第四个說明	86
第五个說明	88
第六个說明	90
第七个即最后一个說明	94
第二节 分工和机器	99
第三节 竞争和壟断	112

第四节	土地所有权或地租	119
第五节	罢工和工人同盟	129

附 录

馬克思	致巴·瓦·安年科夫	139
馬克思	关于自由貿易的演說	151
馬克思	政治經濟学批判(摘录) 柏林, 1859年	166
馬克思	論蒲魯东 (給施韦澤尔的信)	170
注釋	179

德文版序言

面前这本书，是 1846 年底到 1847 年初那个冬天产生的，那时候，馬克思对他的新的历史观点和經濟观点的基本特点，自己已經彻底了解了。剛剛出版的蒲魯东“經濟矛盾的体系或貧困的哲学”一书，給予他把这些基本特点同这个人的見解对立起来加以發揮的机会，从那时起这个人在当代法国社会主义者中間就居于最重要的地位。自从他們两人在巴黎常常为經濟問題作終夜談以來，他們的路是越离越远了；蒲魯东的著作证明兩人之間現在已經橫着一條无法架渡的深沟；置諸不理在当时是不可能的；所以，馬克思就在他的这一个答复里确认了这个不可救治的裂口。

馬克思对蒲魯东的总評价，可以在附在这篇序文后面的那篇文章里^①看到，那是 1865 年在柏林“社会民主主义者”第十六、十七、十八期上发表的。这是馬克思为那个刊物写的唯一的一篇文章；不久，施韦澤尔先生要使那个刊物轉上封建的、政府的軌道的企图暴露了，这就迫着我們在几星期后就公开声明不再投稿。

对于德国，面前这本书恰恰在現在这个时刻具有馬克思本人从未料到的意义。他怎么能知道，当他痛击蒲魯东的时候，剛好命中了他当时連姓名都不知的今日之野心神洛貝尔图呢？

这里不是深究馬克思同洛貝尔图的关系的地方；这件事，我不

^① 指馬克思 1865 年 1 月 24 日給施韦澤尔的信，見本书第 170—178 頁。——譯者注

久就会有机会来作^①。这里只想指出，当洛貝尔图控告馬克思“剽窃”他、“在‘資本論’中大量地利用了”他的“認識”一书“而没有提到”他的时候，他是在肆意誹謗。这种誹謗要找解釋，只能是这位无人賞識的才子的悒悒寡欢和他对普魯士以外发生的事情、特别是对社会主义和經济学文献的非常无知。馬克思既沒有看到这个控告，也沒有看到上述洛貝尔图的著作；关于洛貝尔图，他所知道的，根本只有那三封“社会书簡”，連这些也决不是在1858或1859年以前就知道的。

洛貝尔图有更多的理由认为，在这些信里，他早在蒲魯东之前就已经把“蒲魯东的构成价值”发现了；在这里，他当然又錯誤地自作多情，把自己看成是第一个发现者。不管怎样，他在我們这本书里也就連帶受到了批判，而这就使我必須簡單研究一下他的“关于我国国家經济状况的認識”这本“創业的”小书(1842)，只要这本小书除了(又是不自觉地)包含着威特灵式的共产主义之外还預先披露了蒲魯东的見解。

現代社会主义，不論哪一派，只要是从資产階級政治經济学出发的，几乎沒有例外地都同李嘉图的价值理論联系着。李嘉图在1817年他的“原理”^②中，一开头就提出两条原理：第一，任何商品的价值单独决定于生产这商品所需要的劳动量，第二，全部社会劳动的产品分配于土地所有者(地租)、資本家(利潤)、工人(工資)这三个階級之間。在英国，自从1821年以来，已經从这两条原理中作出了社会主义的結論，并且一部分提得这样尖锐和这样果斷，使得那些現在几乎无人記得、大部分靠馬克思才再度发现的文献，在“資本論”出世以前，一直是不可超越的东西。这些情况改次再談

① 几个月以后，在1885年5月5日，恩格斯写完了他給“資本論”第二卷的序，讲了馬克思同洛貝尔图的关系。——譯者注

② 指“政治經济学和租稅原理”。——編者注

罢。所以，如果说洛贝尔图在 1842 年曾从上述原理引出了社会主义的结论，这对于一个德国人来说在当时肯定是迈出了很重要的一步，但是，至多只能在德国才算一个新的发现。蒲鲁东有过类似的妄想，马克思在批判蒲鲁东时已经证明，李嘉图理论的这种用法毫不新奇。

“只要对英国政治经济学的发展有一点点了解，就不会不知道，这个国家所有的社会主义者在各个不同时候几乎都提倡过平均主义地（即社会主义地）^①应用李嘉图的理论。我们可以给蒲鲁东先生指出如下一些著作：霍吉斯金的‘政治经济学’（1827年版），威廉·汤普逊的‘为人类谋取最大福祉的财富分配原则’（1824年版），托·娄·艾德门兹的‘实践的、精神的和政治的经济学’（1828年版）等等，这一类的著作的名称还可以写上四页。现在我们且来听听一位英国共产主义者布雷先生是怎么说的。这里引用他的出色的著作‘劳动的弊害及其消除方法’（1839年里子版）中最重要的几段话”。^②单单这里从布雷的著作中引出的几段话就把洛贝尔图要求的优先权取消了一大块。

那时候，马克思还没有去过不列颠博物馆的阅览室。他除了巴黎和布鲁塞尔图书馆的书籍，除了我的书籍和札记以外，当我们一起在 1845 年夏天到英国作了六星期的旅行的时候，只浏览了曼彻斯特可以找到的书。这样看来，上述的书籍，在那四十年代并不像现在这样难于找到。如果说，尽管这样，洛贝尔图始终不知道有这些书籍，那完全要怪他的普鲁士的地方局限性。他是普鲁士所特有的社会主义的真正的奠基人，而现在也终于被公认为这样的人了。

但是，就在他可爱的普鲁士，洛贝尔图也不能一点不受惊动

① 括号里的话是恩格斯加的。——编者注

② 见本书第 54 页。——译者注

啊。在 1859 年，柏林出版了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学批判，第一分册”。其中，从經濟学家对李嘉图提出的种种責难中举出下述一点作为第二个辯駁，在第 40 頁上①：

“如果一个生产物的交换价值等于包含在它里面的劳动時間，一个劳动日的交换价值就等于它的生产物。或者說劳动的工資必須等于劳动的生产物。实际情形恰恰相反”。馬克思对此作了如下的注解：“資產階級經濟学家对李嘉图的这种責难，后来給社会主义者抓住了。他們假定这个公式在理論上是对的，責备不符理論的实际，要求資本主义社会在实际上实现从它的理論原則推出的臆想中的結論。至少英国的社会主义者曾經这样地将李嘉图的交换价值公式轉而反对政治經濟学。”② 在同一个注里提到馬克思的“哲学的貧困”，这本书当时在书店里到处都可以找到。

因此，洛貝尔图有充分机会亲自确定一下他的 1842 年的发现究竟是不是新的。他不这样作，反而一再宣告他的新发现，把它看成如此举世无双，以致再也不想想，馬克思也能像他洛貝尔图一样，独立地从李嘉图的理論中引出自己的結論。决不会！馬克思“剽窃”了他，——然而就是这个馬克思向他提供过一切机会，让他确切認識到，这些結論，早在他們两人之前很久，至少在洛貝尔图还保存的那样粗糙形式上，在英国已經有人說到过！

李嘉图理論的最简单的社会主义的应用就是上面所說的那样。这样的应用在許多場合會引向对于剩余价值的源泉和本质的認識，大大超过了李嘉图；就中洛貝尔图也是如此。他在这方面，除了別人早已說过，并且說得至少是同样好的以外，什么也沒有提供，这且不說，他的表現方法还犯了同他的前輩一样的毛病，——他把劳动、資本、价值等等范疇，就在經濟学家們傳授給他的那种

① 見“政治經濟学批判”，人民出版社 1959 年版，第 30 頁。——譯者注

② 見同上第 178 頁。——譯者注

粗糙的、只看表面現象的形式上不加批判地接受下来，而不考究它們的內容。这么一来，他就不仅切斷了自己进一步发展的一切道路，——同馬克思相反，馬克思是第一个从六十四年来被反复背誦的这几条原理作出了一些东西的人，——而且为自己开辟了通向烏托邦的大道，这一点我們就会看到。

李嘉图理論的上述应用，——說全部社会产品、工人的产品属于作为唯一生产者的工人，——直接引导到共产主义。但是，正如馬克思在上述的地方也指出的那样，就經濟形式說，这种应用是錯誤的，因为它不过是将道义运用于經濟而已。照資产階級經濟学的規律，产品的最大部分不属于生产了这些产品的工人。如果我們說：这是不公平的，不应该这样，但是这句话同經濟原来毫无关系。我們不过是說，这些經濟事实同我們的道德感情不合而已。所以馬克思从来没有把他的共产主义要求放在这样的基础上，而是放在必然的，在我們眼前一天比一天成熟的資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崩潰上；他只說剩余价值是由无偿劳动构成的，这是一个简单的事实。但是，就經濟形式說是錯誤的东西，在世界历史意义上却可以是正确的。如果群众的道德感宣布某一經濟事实为不公平，如当年对于奴隶制或农奴制那样，这就证明这个事实本身已經过时，而另一些經濟事实已經出現了，由于这种情况，那原来的事实已經变成不能忍受和不能維持的了。因此，在表面的經濟不公平之后，可以藏着一个非常实在的經濟內容。不过这里不是詳細研究剩余价值理論的意义和历史的地方。

除此以外，人們从李嘉图的价值理論还可以并且已經引出別的結論。商品的价值是由生产商品所需要的劳动决定的。但是，情况是这样，在这个不良的世界上，商品一时在价值以上、一时在价值以下出售，并且这还不只是由于竞争引起的摆动。利潤率恰恰具有一个显著的对所有資本家保持同一水平的平均化趋势，正

如商品价格具有因供需关系把自己归结到劳动价值的趋势一样。但是，利润率是按照投在一个工业企业中的总资本计算的。由于在两个不同的生产部门中，一年的产品可以体现同量劳动，因而代表同等价值，两部门的工资又是同样高，但是一个生产部门的垫支资本可以并且常常是两倍或三倍于另一个生产部门，这里，李嘉图的价值规律就同利润率均等的规律矛盾了，这是李嘉图自己已经发现了的。如果两个生产部门的产品各按它们的价值出售，利润率就不能均等，如果利润率均等，两个生产部门的产品就不能都按它们的价值出售。所以我们在这里遇到一个矛盾，遇到了两个经济规律的二律背反；这个矛盾的实际解决，照李嘉图的说法（第一章第四、五节）一般是有利于利润率而不利价值。

李嘉图的价值理论，尽管有它的不祥之兆，但是也有它使善良的资产者喜爱珍贵的一面。它以不可抗拒的威力诉诸他们的公平感。权利的公平和平等，是十八、十九世纪资产者打算在封建制的不公平、不平等和特权的废墟上建立他们的社会建筑物的基石。马克思已经指出过，商品价值的决定于劳动、按照这个价值尺度在权利平等的商品所有者之间进行的劳动产品的自由交换，是现代资产阶级全部政治的、法律的和哲学的意识形态所据以建立起来的现实基础。劳动是商品价值的尺度，——这个认识一经确立，善良的资产者必然会因世道邪恶感到良心深受伤害，这个世界，名义上承认公平原则，事实上时时刻刻肆无忌惮地抛弃公平原则。特别是小资产者，他们的诚实劳动——尽管只是他的伙计和学徒的劳动——在大生产和机器的竞争下天天跌价，特别是小生产者，必然会迫切希望一个这样的社会，其中按劳动价值交换产品终于成为毫无例外的完全真理，换句话说，他们必然迫切希望一个这样的社会，其中商品生产的唯一一条规律绝对地不折不扣地通行，而把这条规律定要在其下才能生效的那些条件、即商品生产以至资本

主义生产的其他規律都排除了。

这种空想在現代(现实的或精神的)小资产者的思想中是多么根深蒂固，由下述事实就可证明：这种空想在1831年已經由約翰·格雷系統地發揮过，在三十年代，在英国还实际上試办、并在理論上推广过，1842年洛貝尔图在德国，1846年蒲魯东在法国，都把它宣布为最新真理；1871年洛貝尔图再次把它宣称为社会問題的解答，并当作他的社会遺囑；1884年，它又在一群追逐名位的人中找到了信徒，这些人以信奉洛貝尔图为名，准备借普魯士国家社会主义謀自己的好处。

这种空想，馬克思已經把它批判得如此透彻，不論对蒲魯东也好，对格雷也好(参看本书附录①)，因此，我在这里可以只限于对这种空想的論证和描繪在洛貝尔图手上所特有的形式发表几点意見。

上面說过，洛貝尔图把經济学概念的傳統的定义完全按照經济学家所傳給他的形式接受了下來。他絲毫沒有想一想必須加以研究。在他看来，价值是“一物对他物按数量的声价，而这声价被看作尺度”。这个——忠厚些說——非常模糊的定义，至多告訴我們价值大致像什么，却决沒有說出它是什么。可是，这就是洛貝尔图关于价值所能向我們說的一切了，因此，他显然是在寻求一个处于价值之外的价值尺度。他运用了使阿道夫·华格納先生称赞不置的抽象思維能力，以三十頁篇幅把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乱七八糟地攪和在一起，然后得出結論說：真正的价值尺度是并不存在的，我們必須以一个代用的尺度为滿足。劳动可以充当这样的代用的尺度，但是只有在等量劳动的产品总是用等量劳动的产品交换时才是如此，不管“事情本来就是这样，或者由于采取了措施”才

① 見本书第166頁至第169頁。——譯者注

保证是这样。因此，尽管整个第一章都是向我们解释商品“耗费了劳动”、仅仅耗费了劳动，以及为什么，但是价值和劳动仍然是没有任何实际联系的。

而劳动又是不加批判地在它在经济学家们那里通常采取的形式上被接受下来了。不仅如此，洛贝尔图虽然也用两句话提到一下劳动强度的差别，但劳动还是非常一般地当作“耗费的”东西，因而当作度量价值的东西提出来，而不问这个劳动究竟是不是在正常的社会平均条件下付出的。生产者为了生产那一天就可以生产出来的产品，是费了十天呢还是只费一天，他们用的工具是最好的呢还是最坏的，他们的劳动时间是费在生产社会必需的产品和社会需要的数量上呢，还是费在根本不需要的东西上、或者虽然需要却在数量上比需要的过多或过少，——对于所有这一切，根本不提，却只是说，劳动就是劳动，等量劳动的产品必须同等量劳动的产品交换。在别方面，不管适当不适当，洛贝尔图总还随时准备站在全国观点上，从社会瞭望台的高度俯瞰个别生产者之间的关系，然而在这里，他却小心翼翼地避开了这种作法。其所以如此，只因为他从书的第一行起就笔直地驶向劳动货币的乌托邦，而对于劳动就其创造价值的本质进行任何研究，都会在他的航道里投下无法通过的礁石。他的本能，在这里比他的抽象思维能力强得多，——顺便说说，你在洛贝尔图身上发现的抽象思维能力，只是依靠最具体的思想空虚造成的。

现在，过渡到乌托邦的事，在一挥手之间就完成了。为保证按劳动价值进行商品交换成为毫无例外的规则而作的“措施”，没有引起任何困难。具有这个倾向的其他空想家，从格雷到蒲鲁东，都煞费苦心地揣摩过用什么社会制度来实现这个目的。他们至少是设法通过经济途径解决经济问题，通过进行着交换的商品所有者本身来解决这个问题。洛贝尔图却解决得轻便多了。他作为一个老实

的普魯士人，他請求國家幫忙；國家政權的一道命令就指揮了這個改革。

這樣一來，價值是幸運地“構成”了，但構成的決不是洛貝爾圖在這個構成上所要求的優先地位。相反，格雷同勃雷以及其他等人早在洛貝爾圖以前很久的時候，就反復表示過（而且反復到令人生厭的程度）同樣的思想：他們期望有這樣一些措施能使產品在任何情況下都總是只依它們的勞動價值相互交換。

國家這樣把價值構成之後，——至少是一部分產品的價值，因為洛貝爾圖也是有分寸的，——就發行它的勞動券，預付給工業資本家，工業資本家用它發給工人作工資，工人再用他們得到的勞動券購買產品，於是勞動券又流回它的出發點。它運轉得多美，我們該听听洛貝爾圖本人如何說的：

“至於第二個條件，那麼，為了使勞動券上註明的價值真正在流通中存在，必要的措施是只有真正交出一個產品的人才取得一張精確地註明生產那個產品的勞動量的勞動券。誰交出了一個兩天勞動的產品，誰就取得一張註明‘兩天’的券。只要嚴格遵守這條規則發券，這第二個條件也就能滿足了。因為照我們的假定，貨物的真正價值總是同生產這貨物時所費的那個勞動量一致的，而這個勞動量的尺度就是普通的时间段落，於是無論誰交出一件費過兩天的產品，得到註明兩天的券，他得到證明的，不多不少恰恰是他實際交出的價值，——並且，因為只有真正把一件產品投入流通的人才取得一個這樣的證明，那麼，券上註明的價值也就一定存在着，足以滿足社會的要求。不論我們把分工的範圍想像得多么廣闊，只須嚴守這條規則，實際上存在的價格總額必定恰恰等於所註明的價值總額。可是因為註明的價值總額恰恰等於提交的价值總額，所以後者也必然會與實際存在的價值總額相符，一切要求都會得到滿足，清算也會正確地進行。”（第 166—167 頁）

如果說，到此為止，洛貝爾圖的命運總是不濟，他的新發現總是來得太遲，那麼，這一次他至少在一種獨創性上建了功勳：在他的對手手中還找不到一個敢于以這樣幼稚天真、透徹明淨、可以說地道的波美拉尼亞形式說出勞動貨幣烏托邦的痴話的人。因為對於

每一張券都提供了一個相當的價值對象，而價值對象又沒有一個不是對一張相當的券而交出的，這樣，券上的總額必然總是同價值對象的總額相抵；計算下來連一點餘額也沒有，一秒钟勞動都不差，連資格再老的政府總金庫出納員也沒有一個能夠找出絲毫計算上的錯誤。還能要求些什麼呢？

在現今資本主義社會中，每一個工業資本家承擔着生產上的一切責任，生產什麼，如何生產，生產多少，都隨他的意。但是，在他來說，社會需要仍是一個未知數，無論關於所需要的對象的質量、品種，無論關於它們的數量，都是這樣。今天還不能充分迅速供應的東西，明天可能供應得大大超過需要。儘管如此，需要畢竟是這樣那樣地、好壞得到滿足，生產總的說來畢竟轉到需要的對象上去了。矛盾是怎樣得到解決的呢？通過競爭。競爭又怎樣解決問題的呢？非常簡單，對於品種上、數量上不合當前社會需要的商品，競爭使它們的價格落到它們的勞動價值之下，通過這種拐彎的辦法，競爭使生產者感覺到，他們或者是生產了根本不需要的東西，或者東西本身雖然需要，但生產的數量已經超過需要、成為多餘的了。從此得出兩條結論：

第一：商品價格對商品價值的不斷背离是一個必要的條件，只有在這個條件下並通過這個條件，商品價值才能存在。商品生產的價值規律，只有通過競爭的擺動以及同競爭一起的商品價格的擺動，才得到貫徹，商品價值的決定於社會必要勞動時間，也只有在這情況下才成為現實。因此，價值的表現形式——價格，一般看來多少不同於它所表現的價值，這種命運是價值同大多數社會關係所共同的。國王同他所代表的王國看來也是大不相同的。因此，在一個進行交換的商品生產者的社會里，想把勞動時間決定價值這一條確立起來，而又禁止競爭用加壓力於價格的辦法，即一般說來唯一可行的辦法來確立這種價值決定，——這種想法不過證明，

至少在这方面，他采取了空想主义者惯有的輕視經濟規律的态度。

第二，竞争既然使商品生产的价值規律在一个进行交换的商品生产者的社会里发生作用，它也正因为如此使社会生产在这种条件下唯一可能的組織和安排得以实现。个别的商品生产者只有从产品的跌价和漲价才亲眼看到社会需要什么、需要多少和不需要什么。但是洛貝尔图也是它的代表人之——烏托邦却恰恰要廢除这个唯一的調节者。如果我们問，我們有什么保证使每种产品都是生产一个必須的数量而不是过多，我們不致一面缺乏谷物和肉类，同时却漬在甜菜糖堆里和醉倒在馬鈴薯酒里，我們不致一面裸着身体沒有褲子穿、一面却有千千万万褲子鈕扣滾滾而来，——那么，洛貝尔图就得意洋洋地把他的漂亮賬指給我們看，照他的計算，对每一磅多余的糖、每一桶銷不出去的酒、每一顆縫不到褲子上去的鈕扣，都正确地发过券，一切都严格“相符”，“一切要求都会得到滿足，清算也会正确地进行”。誰要是不信，可以去請教波美拉尼亚的那位政府总金庫出納員某甲，他审核过賬目，查明无誤，他在出納上从未出过舛錯，完全可靠。

現在，我們看看洛貝尔图的又一个天真想法——用他的烏托邦消除工商业危机。从商品生产已經以世界市場的范围来进行之后，遵循着私人打算进行生产的个别生产者同他們为之生产、却对于所需的质量和数量方面多少不清楚的市場之間，是靠世界市場的風暴、靠商业危机来平衡的^①。因此，如果禁止了竞争，——它通过价格起落把世界市場情况告訴个别生产者，——人們就完全閉塞了眼睛。把商品生产安排得叫生产者一点也不知道他們为之

① 至少直到不久以前的情况就是如此。自从英国在世界市場上的壟断由于法国、德国、特别是美国的参加世界交易而被打破以后，似乎有一种新的平衡形式起作用。危机前普遍繁荣时期比較少見了。如果它完全不出現了，长期停滯加一些輕微的摆动将成为現代工业的常态。〔恩格斯注〕